第一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的建设

第一节　党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奋斗

一、建国初期的社会矛盾。三大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基本解决，但是，在建国后的最初两三年内，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还没有立即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民党军队仍有百万人盘踞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台湾等一些沿海岛屿，人民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二是西藏仍处于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在领主的黑暗统治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三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往台湾，但在大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留下大批政治土匪（最多时达 100 多万人）、特务等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他们仍在负隅顽抗，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四是新中国成立时，约有 1.6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约占 3 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还没有被推翻，盘根错节的封建经济关系还统治着广大农村。在国外，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包围，伺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以上形势说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仍然威胁着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主要阶级矛盾还没有立即转变。毛泽东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1〕只有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推翻地主阶级，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巩固，国民经济才能得以恢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才能确立，新中国才能站得住。

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 35 人，候补中央委员 27 人，并有各省、市委书记及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 43 人参加，出席会议的共计 105 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纠正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四面出击”的错误倾向。全会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的发言，讨论了有关土地改革、外交、财政经济、国内政治、党的组织和整风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详细地分析了这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中心任务，规定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需要的 3 个条件，即：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中央还提出了应当做好的 8 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我们当前

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2〕他又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仅用 8 个月的时间，即到 1950 年 6 月底止，歼灭国民党在大陆残留的部队 200 余万人，肃清了土匪；解放了除台湾和某些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1951 年 5 月 23 日和平解放西藏达成协议，标志着西藏的新生，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了 2858 家控制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地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此期间，党领导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1950 年 6 月 25 日，为朝鲜统一问题，南北朝鲜爆发内战。南朝鲜李承晚统治集团，是受美帝国主义扶持的。6 月 27 日，美国公然宣布直接出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和警告，把侵略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大门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 年 10 月 19 日，

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历时三年零一个月取得了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吞并全朝鲜并进而侵略我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捍卫了远东的和平，极大地鼓舞了亚洲和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全国人民通过抗美援朝的教育，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扫除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 年冬开始，全国新解放的地区有步骤有秩序地陆续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贯彻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并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在这次运动中，党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方针，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和平土改”或恩赐式的“官办土改”。到 1952 年底，全国农村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台湾等地区外，占 90%以上的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 3 亿农民分得了约 7 亿亩土地，每年不须再向地主交纳约 700 亿斤粮食的地租，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赖以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它推翻了压在农民头上几千年的大山，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它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反复辟斗争。1950 年 6 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1950 年 2月23 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 10 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这一运动。 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惩治反革命的法律依据和斗争武器。斗争矛头，集中地打击 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运动中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放手发动亿万群众起来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采取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决定性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三大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紧紧依靠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广大党员在带领群众斗争中受到考验、锻炼和改造，党进一步取得了崇高的威望。

二、国内主要矛盾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随着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52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4] 建国初，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调节政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内领导与反领导、限制与反限制和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50 年初，围绕着稳定市场物价，工人阶级就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夺国民经济领导权的较量。不法资本家趁国家财政经济暂时困难之机，采取非法手段，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从中牟取暴利。党和人民政府运用政权力量，沉重打击金融投机势力，通过国营企业掌握着足以左右市场物价的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抛售，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重大打击。1951 年底至 1952 年上半年，有不少资本家违背《共同纲领》，采取种种不法手段，向国家干部行贿以获取高额利润，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破坏抗美援朝。对此，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给资产阶级的进攻以坚决的反击。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说就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允许其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对于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一面则加以限制。这就产生了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以及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便提到了重要日程。

1952 年下半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1954 年 2 月 10 日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5〕

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无先例可循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6〕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改造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三大改造之前，我国是 5 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国营经济占 19.1%，合作社经济占 1.5%，公私合营经济占 0.7%，资本主义经济占 6.9%，个体经济占 71.8%。国营经济虽然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已掌握在国家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私有经济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们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三大改造势在必行。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引导亿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走合作化道路。1951 年 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 月,印发给各级党委,要求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建立各种互助组，同时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使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转入普遍建立和大力发展初级社的阶段。1955 年 7 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0 月，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并进入了高潮。至 1956 年 6 月底止，全国已经组织起 99.2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1.7%，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0%。

我国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适合我国农民特点的逐步前进、互相衔接的 3 种形式，即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等一系列过渡形式。使广大农民在逐步过渡中提高觉悟，逐步适应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所以，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总的说来进行得比较顺利，农业生产上升，避免了在生产关系变革中出现农业生产下降和农业遭到破坏的现象。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方法上，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1956 年，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组织了约 10 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组）的人数达 603.9 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 91.7%，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工商业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要改变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理。“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7]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赎买对象，是指整个资产阶级而言，是从资产阶级手里

赎买生产资料。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曾先后两次进行赎买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因为苏联的资产阶级敌视苏维埃政权，拒绝接受赎买政策。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没收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把它收归国有。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赎买政策的理论，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获得成功。基本经验是：首先，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对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官僚资本采取无偿没收归国家所有的政策，这就消灭其封建买办性来说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就消灭大资本来说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民族资本家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各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第一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1954 年，我国开始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1955 年底，把个别公私合营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到 1956 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 99％、私营商业人数的 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次，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和对从业人员的改造结合起来进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通过不断的教育，把资本家由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如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错误地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对后一阶段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

不良影响。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经济破败不堪，生产技术长期停滞在中世纪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工业国家，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左右。1949 年，工农业生产都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 1936年大大下降。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 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 30％ ,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 70％，内外贸易滞塞，投机盛行，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贫困。当时我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为 210 公斤，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的掠夺，农民实际占有粮食平均每人每年仅有 100公斤左右，亿万人民只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在进入城市后，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8〕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在工作中，注意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生产关系变革任务与艰巨的恢复经济工作相结合，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为出发点，既有总的指导方针，又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做到了运动与生产两不误。

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人民政府没

收了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收回海关，控制对外贸易，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实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种民主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及其他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消除障碍，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为了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人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国家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调配战略物资。陈云反复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由于采取了各种正确的措施，到 1950 年 3 月，人民政府完全稳住了全国的市场物价。

党确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5 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

经过 3 年的艰苦努力，到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了 20%，其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比 1949 年增长 144.9%，比 1936 年增长 22%，农业连续 3 年丰收，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村副业）比 1949 年增长了 48.5%，比 1936 年增长 18.5%。工农业生产的完全恢复，财政收支的平衡，金融物价的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已获得基本好转，提前完成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

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制定了从 1953 年至 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主持制定的。1952 年 6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调查酝酿，编制草案，经 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 694 个大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分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到 1957 年；“一五”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建立起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或者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工业技术力量得到加强，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生产稳定发展，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建设取得新进展，运输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它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主要是：第一，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保证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第三，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第四，讲求经济核算，注意提高经济效益。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建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第二节　整风、整党运动，抓住推进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

一、及早敲起反对腐蚀的警钟，防患于未然

党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深刻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新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就预见到执政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早地敲起了反对腐蚀的警钟。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号召大家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 300 周年的文章,说的是 1644 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 1645 年陷于失败。毛泽东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

1948 年 12 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曾尖锐地提出：“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10〕

1949 年 3 月，鉴于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在改进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的同时，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

提出胜利后防止居功骄傲，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次会议上，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为执政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1950 年的整风运动密切了干群关系

1950 年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党内有一部分党员，特别是负有相当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向群众摆党员的架子，摆老资格、恃功挟赏、以功臣自居，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不愿意或不善于与党外群众以及民主人士合作。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与错误，中共中央于 3月 25 日发出关于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指示，指出：“我们在这里特地重新发表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两段文章，作为当前全体党员学习的一种材料”，“两段文章重新发表，目的就是要全党同志特别是犯有关门主义毛病的同志，认真的加以学习，并据以进行检讨，以便克服我们党员和党外群众团结合作中的缺点，并把这一合作加强起来。”在这两段文章中论述了共产党员与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所以有力量，共产党员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员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党周围，没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信任，便不会有现在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提出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并对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合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4月 19 日，中共中央鉴于在党执政后，由于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党内出现有些党的干部骄傲自满，拒绝党内外批评，压制批评等新情况，特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

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政权，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以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决定还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办法，以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有效地进行。以上两文件，被列入 5月 1 日后整风的重要内容。

1950 年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党的指示。5月 24 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 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个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胜利地向前推进了。 ”〔11〕

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之所以如此的重要与必要，这是由于：

第一，中国共产党已取得全国胜利，党员增多，其中许多人思想作风不纯，还没来得及给予有计划的教育训练。据 1949 年底统计，全国有党员 450万人以上，其中大革命时期及以前入党的仅 600余人，占党员总数的 0.013％ ；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约 3 万人左右，占 0．67％ ；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有 111 万人左右；占 24.67％；而解放战争时期到 1949 年入党的约有 330 万人以上，占 73.33％ 有的地方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就开始大量发展党，有的不适当的执行建党方法，结果将一些不够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拉进党内，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水平，甚至还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少数反动分子混进党内，造成组织上的不纯。

第二，在老党员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在党员干部的作风上存在着缺点。一是，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有些干部不依靠群众，不用说服的方法，而是用粗暴的强制方法来完成任务。无论是在完成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工作中，还是工厂管理、农

村组织合作社，以及文化教育改革工作中，都发生过命令主义的错误；有的甚至超出了命令主义的范围，乱打人，乱扣人，横行霸道，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二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有些干部不了解情况却乱下命令，有的工矿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事故和浪费也很严重。甚至有的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严重的现象也有所发生。因此，中央要求，在全党全军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的整顿全党作风，尤其是整顿干部的作风。

为了搞好整风，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发出整党指示之后，中央又在 5 月 21 日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6 月发出责成各地党委负责人于整党整干运动开始时，就当地党内情况作一报告的指示。6 月 6 日至 9 日，党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提出要搞好整党，并把它作为争取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 8 项重要工作之一。在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做了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遵照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及大军区党委都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决定。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分别作出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西南局、中南局分别作出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华北局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整党整干指示的决定。各中央局一致强调，必须坚决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学习整风的有关文件，总结检查工作，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

这次整风的重点，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中心的问题是解决党群关系问题。这次整风的方式，根据中央关于整党的指示，主要是采取“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的进度要求在 1950 年夏秋冬 3 季内完成。在步骤上，新区和老区又有所不同，在新区要进行土改、减租和剿匪等任务，因此整风时间短促，在夏秋两季完成。

整风运动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进行。各地整风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有的是召开整风会议或三级干部会；有的举办整风训练班，有的是采取召开专业会、干部座谈会；少数地方是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检查领导作风。

首先，由各地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央决议、地方情况和党内倾向，作整风报告。如西北局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报告，对西北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作了具体生动的分析，给干部以启发。为此，中央发出指示：“中央望各中央局、各省、市负责人在各地整风运动开始时，都能作这样一篇演讲或论文，分析该区领导机关与下级人员工作作风中的主要缺点，举出足以为典型的实例，公开发表，作为该区整党的主要教材，以便学习者用以来做学习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的桥梁。”

其次，学习指定的文件。中央规定毛泽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及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为整风的主要学习文件，同时，要求学习斯大林 1933 年 2 月 19 日《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毛泽东 1941 年 11 月 6 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议》等文件。在新解放区，将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整党学习文件，以便在整党学习后，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各地还根据需要规定了必读的文件。《人民日报》为配合整风运动，发表了《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环节》、《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坚决肃清恶霸作风》等指导性的社论。

在学习整风文件时，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结合检查工作，开展了自我批评，不仅对文件、对问题的了解比较深刻，而且初步检查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另一种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学习，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